目　　录

天津早期革命工作和顺直省委的建立 …… 吕职人（1）
柳直荀在天津的革命活动片断 …… 王兰垣（24）
回忆毛泽民同志在天津 …… 钱希均（34）
我在华新印刷厂一段工作的回忆 …… 何实嗣（40）

冀中抗日斗争的回忆片断 …… 李　浙（42）
回忆父亲高士一在冀中抗日的始末 …… 高万德（65）
冀中高士一父子组织抗日武装的见闻 …… 杨泽民（86）

解放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 鲍觉民（97）

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 ……马　明（112）
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 ……曹　禺（140）
南开剧话拾遗 ……黄宗江（145）

天津佛教经忏佛事的变迁 ……李慈浩（148）
我和天后宫 ……张修竹（158）

补白　奇袭雁门关（64）　抗日战争时期的雁翎队（96）
日本扶植下的中华佛教会（15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津早期革命工作和顺直省委的建立

吕　职　人

天津党团组织建立前后——“五卅”运动在天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顺直省委建立前后——顺直省委领导下的玉田暴动

一、天津党团组织建立前后

这里所说的天津早期革命工作是指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革命工作在天津的发展情况。

关于天津党团的建立问题，我是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一次与于方舟、韩麟符等同志谈话中得知的。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方舟和韩麟符（致祥）分别是天津和三特区（热、察、绥）代表中的一员。当时于、韩二人都已是共产党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中他们都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议结束后，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中央赋予于方舟同志建立国民党直隶省党的工作任务。于方舟和韩麟符遂邀李永声（字立三，后改字锡九）、江浩回北方组建直隶省国民党的工作。

China

李永声和江浩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分别被选为参众两院议员（李为参议员，江为众议员）。以后他们又参加过“讨袁护法”运动，并反对张勋复辟和曹锟贿选等活动，思想进步，始终站在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并且为了革命都把自己的家产大部分用在革命运动上。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二人的思想更前进了一步，和李大钊同志时有接触。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这对他们也是个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于是，他们提出如果要他们回北方组建直隶省国民党的工作，首先要求允许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方舟向当时中央在广州的负责人汇报后，经中央慎重考虑，认为他们过去一贯表现很好，遂同意吸收他们为中共正式党员，回津兼作国共两党工作。中央并决定：因为天津党已有了相当发展，要求于方舟回天津后，立即把党团员分开，成立天津党的地委和团的地委，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关于于方舟和韩麟符，他们都是直隶省官立中学（即后来的天津市铃铛阁中学）的学生，同时参加“五四”运动，也同时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又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四年初，韩麟符主要负责热、察、绥三特区党的工作，因为他是北方区的成员，所以便协助天津分立党、团工作和协助组建直隶国民党的工作。

天津党、团分立，意味着党、团组织的正式建立。时间大概在一九二四年三、四月间。第一届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是于方舟。李永声（锡九）担任组织工作，江浩（竹元）担任宣传工作，委员有卢硕棠（绍亭）。由于李永声的社

China

会地位较高，家又在北京，实际上天津党的组织工作是由卢绍亭在负责。委员李连祺则兼团的书记。起初地委成员是否还有张兆丰、郝久亭以及安幸生、李培良等，我现在已不敢肯定。第一届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书记是李连祺，成员有：崔浦、阎怀聘、宋树藩、杨洪涛、杨凤楼等。天津党、团正式建立后，党、团和群众工作都有显著发展，出现了新气象。

至于我的入党和参加工作的情况是这样的。记得一九二四年四月中下旬，当时我正在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读书（在学校时叫吕贺光，参加革命活动后改称吕职人）。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图书室看书，传达室通知我有两位客人来找。到了接待室，见是当年丰润县车轴山中学老同学卢硕棠，他介绍另一位是于方舟。这是我和于方舟结识的开始。这次三人见面，谈了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谈起，看到中国人民内受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外受帝国主义的粗暴侵凌，人民极度困苦，认识到只有革命，只有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对内打倒军阀，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政权，才是中国的出路。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很深刻，我却受到了走向革命的初步教育。

这时，我所在的天津第一师范学校已有学生会的组织，并且因为伙食太次，曾经举行过一次全校罢课，要求提高公费待遇，改进伙食，取得了初步胜利。我和辛璞田等在校内组织起一个文化团体。由于学校当局的压制，几经交涉，取名“进修会”，以“进德、进修”这样的灰色形式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曾出版了三期《进修月刊》，因经费无着而停刊，但对新

China

文化运动的宣传多少发生过一点影响。

从这时起，我就时常和卢硕棠、于方舟等人接触，也常去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接触到韩麟符、李连祺（希逸）、王应生等人，更有时去义庆里四十号，这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后，建立的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秘密地址，同时也是中共天津地委利用作为秘密交通的地址。这时，于方舟就住在这里，所以我去到以后接触的人就更多一些，如与安毓文（幸生）、李培浪、江浩，以及唐山地委书记、南厂工人领袖邓培等人都是在这里认识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失败而告终。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先生北上，发表北上宣言，号召召开全国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杜绝军阀专政，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天津也不例外。于方舟、江浩等遂公开出面，发起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经常在东马路青年会举行会议，发动各界广大群众，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广泛宣传。我和辛璞田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且受到革命实践的初步锻炼。

在天津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之始，由于党的政策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就把各界都组织进来了。如在“五四”运动时期即已知名的爱国人士、国货售品所的总经理宋则久，教育界的马千里等。此外，还有时子周、鲁嗣香、李散人等，甲种商业学校的王南复，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裕元纺纱厂总工程师张万里，以及印刷工会的陶卓然，农民代表李凤和，平民夜校的积极分子宋朝义等，都参加了活动。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动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加，造成的革命声势是比较大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初某日下午，我和辛璞田正在义庆里四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号谈话，卢绍亭从天津地委（普爱里）开完会到这里，见到我们说："地委已决定批准你们两人为中共正式党员。"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高兴。这次地委会议，主要针对各学校放寒假前布置各校支部回乡党员应做的工作。我和辛璞田随即在第一师范学校吸收党员，如：刘人瑞（石生）、马鸿图（伯超）、陈临武（仲元）、赵民悦等人，并组织起党的支部。这时如南开大学和中学、官立中学、甲种商业学校、水产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华洋中学等，都有了党的组织。工人运动更有较大的发展。

自天津地委正式建立后的工作，我有明显的感觉：一方面是经常隔一两个星期请北京各大学名教授来天津作学术讲演，藉以广开舆论，唤起社会共鸣；另一方面，则切实深入各工厂码头、学校及各行业，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发展党、团员。这项工作由安幸生、李培良等负责。小刘庄一带和河东的各纺织厂、码头、印刷厂、电车公司等，一般都有了工会组织和党、团支部的组织。

这时，我就住在义庆里四十号。于方舟、李希逸、韩麟符、安幸生也住在这里。晚间我们经常谈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理论问题，大都是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为中心内容，对阶级的形成、阶级的划分、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等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尤其于方舟同志对学习很重视，经常督促同志们学习。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当时在北京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组织"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相对抗。随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党右派，即所谓"西山会议"派，如邹鲁、谢持、覃振、张继、孙科等，在中国革命走向高

潮的时候发抖了，并阴谋反共和反对国民党左派。这时，就全国局势来说，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已无形破裂，随孙中山北上的国民党左派又返回广州，故而国民会议运动从高潮低落下来。

二、“五卅”运动在天津

天津的党、团建立后，工作迅速展开。经过反对军阀内战的斗争和国民会议运动，党、团组织都有较快的发展。群众的组织，如学生会、各基层工会、妇女会等，都有相当基础。正因为各项工作都在发展，党、团的领导机构也略有变动。一九二五年春，天津党的地委书记由中央通过北方区派李季达同志担任。于方舟同志担任组织兼国民运动，李连祺担任宣传。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英、日帝国主义打死工人顾正红的惨案发生后，立即爆发了“五卅”风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强大运动。全国各地进行声援，天津方面也立即响应。党、团干部深入基层，首先发动了中学以上学校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组织全市工、学、商各界在南开大操场举行万人大会并游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残酷枪杀工人的暴行。发表通电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戾行为，提出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及英、日对华各项不平等条约，及惩凶道歉，抚恤受害者等要求，并立即假天津商会会议厅召开了工、学、商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推举商会、教育会、国货售品所、学联、妇联、反帝同盟等代表为委员。经常主持会议的是于方舟、辛璞田、李希逸等人。我当时是以“教育研究会”的名义参加的。

各界联合会成立后，立即组织起宣传队，分别在重要街道路口，大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并深入到各商店劝说提倡国货，封存英、日货物等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为了打击英、日帝国主义，组织上派安幸生深入码头，策动外轮，特别是英、日帝国主义的商船，发动海员罢工，组织码头装卸工人拒绝装卸英、日轮的货物。并组织起海员工会，在原法租界佛照楼旅馆租赁房间作为办公地址。同时小刘庄一带的裕元、北洋，河东的裕大、宝成和恒源等纺织厂，均陆续发生罢工风潮。有的取得适当条件的胜利而复工，有的则由于资方的压迫，斗争益趋激烈。记得一次宝成纱厂罢工，劳资双方相持不下，厂方封锁了工厂大门，厂警打伤了一个工人的十来岁的男孩，更引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激。天津地委得到情况后，书记李季达把我找去，让我以各界联合会的名义去调解，并劝说工人，表明我们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工人；因此，凡是有外国投资的工厂，我们坚决罢工，中国资本的工厂，最好不罢工，这也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到宝成纱厂时，厂方封锁着大门，部分工人在门外抱着一个受伤的男孩子。我当时向工人代表把来意说明，并且向厂方传达说要见经理。结果厂方派出代表，我说明来意后并告诫他们说："反对帝国主义也是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厂方纵容厂警随意打骂工人，并把工人子女打伤，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许的。我来的意思是调解双方合理解决纠纷，以便迅速复工，否则我们联合会不管了，出了什么问题，应由厂方负责。"结果厂方代表邀了工人代表进行谈判。最后，厂方同意对受伤儿童负责医疗，同时保证不再打骂工人，并同意增加了一点工资。

由于海员和码头、纱厂工人的罢工，街上的行人增多了，

China

社会秩序显得更乱些，再加上游手好闲者，或乞丐们乘机钻空子。反动当局就以此为借口，企图对运动开刀镇压。七月初的一天，联合会接到电话通知说，督办李景林请联合会去几位代表到督办公署开会。下午有李希逸、李散人、安幸生、杨衡南和我去金钢桥督办公署。李景林在接见我们代表时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人罢工秩序很乱，有人在街上抢东西吃；一个是这次运动既是为了支援沪案，是对外的，为什么提出“打倒卖国军阀”这个口号？我当时答复说：“工人罢工是爱国行动，同时是有工会组织的，不会有抢东西吃的行为。可能是社会上流氓、小偷们乘机干的，绝对不会是工人。再有，联合会曾通电全国和天津各界要求募捐援助，捐款一律寄交天津总商会代收，但商会把捐款卡住不给，工人既得不到工资又得不到救济，饿着肚子总是不行的，因此个别人有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可以原谅的。为此，请督办命令商会把收到的捐款，应该由联合会支用，给工人发一些救济费，我们负责劝导工人维持社会秩序。至于‘打倒卖国军阀’的口号的提出，是因为湖北督军肖耀南镇压码头工人引起的。”李景林对此不作正面答复，只是说：“那你们就提打倒肖耀南，或者打倒我李景林都可。”接着便讲起世界和国家大势来了，他说：“你们知道吗？中国目前是两大势力：一方面是张大帅，有日、法两国支持；一方面是直系，有英、美两国支持。如果事态扩大了，可能引起国际干涉和国内战争，到那时局势就不可收拾了。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有事我再找你们，希望你们回去向大家讲一讲。”事后，我们向地委作了汇报，并加以分析，估计反动当局可能要准备镇压。

八月初的一天下午，军警督察处给联合会打电话说：“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督办召集你们开会，请几位代表先到军警督察处。”我们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阴谋，认为是司空见惯，去就去吧！于是我和李希逸、安幸生、李散人、黄琴父、杨衡南、李公权等几个人，先到督察处，坐在长条桌两旁。稍停督察处处长李书凤（李景林的侄子）、警察厅厅长丁振芝和商会会长卞月庭等坐在横头。李书凤先开言说：“你们的人在街上抢吃的东西，秩序很乱，你们应该负责！”我们当即反驳说：“那绝对不是工人和学生所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再者，他们罢工、罢课是为了爱国救国，而募捐的款呢，商会也在这里，有人扣压着不给，工人得不到救济，人总不能饿着肚子，他们是无罪的。”我们看形势比较严重，就说：“督办召集我们开会，我们马上去督办公署。”李书凤说：“等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回来说：“督办不让你们去了，请你们到后边去罢！”说着就有若干军警把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搜了一下，把腰带解下，押到后边拘留所。对每个人还带上了脚镣，分开几个号里押着。接着又押进辛璞田，他是学联主席，对他还经过严刑拷打，轧槓子，晕死过两三次，用凉水喷醒的，工人姬兆生也经过严刑拷打后押进牢房。随后又押进纱厂工人贺志，海员工人陆苗根，以及陆荇等，分别在各牢房监押。我和贺志、陆苗根在一个号房里。这次被捕的人，我记得共有十七人。

在“五卅”运动开始前后，各纱厂均有罢工，此伏彼起，与海员及码头工人配合得很好。这次裕大纱厂罢工是重点，因有日本人投资，斗争相当激烈。工人激于义愤，砸了厂方的办公室，斗争达到了高潮。由于奉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恐惧，便互相勾结进行残暴镇压。这时，各界联合会虽然会址已被查封，但在党的领导下仍在活动，仍然向军阀李景林提出强

烈抗议，并通电全国历述奉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镇压群众的罪行，要求迅即释放被捕各界代表和人员。

当时，全国各地的运动也都受到挫折。只有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声明，严斥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镇压群众的罪行，并给省港大罢工以坚决的支持。这次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次大演习，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掀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作了准备。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被关押的事。

天津军警督察处的拘留所原系天津田房交易所旧址，各室都有暖汽设备，暖汽片虽已拆除，而连通各室的管子并未拆掉。这十七人中有五个是共产党员，即：李希逸、安幸生、辛璞田、姬兆生、吕职人。我们订出暗号，利用墙角的暖汽管敲几下为叫几号，互相进行联系。当时公推李希逸为组长，仍然过着党员的组织生活。

在拘留所内逐渐和看守兵熟了，对其中一些人做了争取工作，并且给他们一点外快，就利用他们下岗的机会，把拘留所内被押同志们的情况写信给地委，主要把信送到义庆里四十号。

记得在运动后期，于方舟同志曾因病发高烧，暂回宁河县俵口老家去医疗了一个时期，这时已经回到天津。每次的信都是他代表地委回信给我们，告诉我们外面仍在多方设法营救，同时把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地革命情况告诉我们，鼓励战友，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并且还送进一些书报给大家阅读，还能送进一些日用品如肥皂、衬衣等。党为了教育党员提高认识，要求每个党员写一份简单的感想。当时我只写了一首七言诗。因我根本不懂诗词，更不懂韵律，所以只是随想随写凑成

几句，聊表一下当时的思想而已。我是这样写的：“如今贫富太殊悬，阶级斗争已显然。潮由压迫生反抗，事经盘错志弥坚。大地浮沉谁作主，小牢铁底我坐穿。留得此身为世用，不怕牺牲是少年。”

中秋节这天，由外边要来了几块钱，大家疏通了看守人员，把我们这十七个人集中在一个号里，买了点熟菜、馒头、大饼，大家借机过节，互猜谜语，叙家常，谈感想，更激起革命热情和革命团结，几乎忘掉了牢狱之苦。

在拘留所，我们也曾研究过发动一下斗争，要求改善伙食等。因为当时一同坐牢的大部分是贩毒犯，督察处长李书凤抓住贩毒犯以后，没收了他们的大烟土，在他开设的大东旅社内设鸦片烟馆，藉此搜刮了很多钱财。此项收入据当时估计即占督办公署总收入的百分之一、二十。其次就是土匪抢劫犯。再就是外省外地的少数资本家、地主到天津办事、办货，因游逛妓院吃花酒闹事，被抓进拘留所的，其目的就是敲竹槓。我们和这样的犯人关在一起，想搞共同斗争，似乎可能性不大，我们的人又少，所以没有发动。

由于党在外边营救和舆论的压力，李景林表示“对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把每个人的脚镣去掉。过了些日，又把我们这十七个人一起绑赴他的军法处过堂。由大胡同南口经金钢桥，一路上我们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组织国民政府”等口号，大家斗志更加高昂。

当时督办公署的地址即现在的金钢公园和医院现址。这次过堂审讯只是草草一问，随即用汽车押送到西营门陆军监狱（即第三监狱）。到那里是一个大房间，一面大木板铺，我们

China

这十七人住在一个房里，虽然也有军警站岗，但对“犯人”的行动比较放松一些，不像在拘留所时，每日上下午只放风一次。监狱并准许亲友探视。

到了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于国民三军孙岳打跑了李景林进驻天津，局面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二十六日那天，组织上用汽车把这十七位革命战士从狱中接出来。我记得从被捕到出狱一共坐了四个月零二十六天牢，我们经受了一次革命实践的严峻考验。“五卅”运动在天津大大锻炼了党，锻炼了革命战士、党员和广大群众。

由于天津局面的改观，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店员工会等各界群众组织不仅迅速建立起来，而且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因而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孙中山先生前进一步，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方的国民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也推动了一部分军人如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方振武、邓宝珊、刘珍年等向国民党靠拢。北京执行部虽然有丁惟汾、王法勤、李石曾等参加，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大钊同志和于树德同志。这正体现了共产党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实际领导地位。当时对所有在北京、天津和北方较大城市的大中学校的共产党员，在寒暑假返里期间，均负有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共产党县委或支部和发展国民党员组织国民党县党部的双重任务。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出现

的大好形势。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都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直隶省，这些组织在“五卅”运动和领导农民及农村小学教师在减租、减息、减税、增加教员薪资等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三军打跑了奉系军阀李景林进驻天津后，党虽然领导着广大群众组织，但党的名义并未公开，只是把直隶省国民党、天津市总工会、学联、妇联等群众组织公开出来。最初是利用东北角大胡同外的大东旅社挂出牌子，以后又迁到东门里旧道尹公署办公，还组织举行了对国民三军较为热烈的欢迎。

这时由南开中学教员黄琴父等在“五卅”运动期间创办的《救国日报》又重新恢复起来。同时以天津总工会名义创办了一个《工人小报》，由邢克让任编辑。北方区委赵世炎同志和于方舟同志对这两张报纸亲自指导，审阅稿件，使这两报在广大群众的斗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救国日报》除刊登重要的国际国内政经新闻外，还登载全国各地的群众斗争情况，以及适当地揭露社会黑暗面和发表短评为中心内容。《工人小报》则以本地及各地工人斗争消息为中心内容。两报都很受群众欢迎。

国民军驻天津这个时期，党利用国民党和群众团体可以公开的有利条件，抓紧了党的建设和巩固群众组织的工作。当时深入工人群众中工作的有安幸生、李培良、邢克让等人。特别加强纺纱厂集中的小刘庄地区，由于工作的开展和需要，成立了区委。同时市区内的印刷工厂（包括各大报馆）也逐渐有了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交通工人如电车公司、津浦大厂（即现在的铁路机车车辆工厂）等党和工会组织也都有了发展。各

大、中学校，以及小学教师中也大有发展。崔浦、阎怀聘、宋树藩、辛璞田、陆荇等都是当时的党团骨干；妇女同志中如邓颖超、江韵清、王贞儒、陈奕涛等在妇女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这时，北方区的工作也有大的发展，赵世炎同志就经常到天津、唐山、绥远、张家口、太原等地视察指导党的工作。尤其在天津的时间较长，天津的工作得到了加强。

国民军在平津占领期间，北方区党的发展比较快，以直隶省而论，全省共有一百二十八个县，差不多有一百一十个县建立起县委或党的支部组织。当时在直隶省范围内的天津地委由李季达担任书记；唐山地委由邓培任书记；保定地委的书记是邓中夏；北京地委书记是谁已记不清了。

为了加强统战工作，我们还作国民党的工作。天津地委由于方舟同志负责推动国民运动。这时国民党在直隶省已有一百二十个县有了临时县党部和正式县党部的组织。只要有党组织的县，则国民党县党部都有共产党员参加，而且负主要责任。这样在直隶省境内的减租、减息、减税、抗捐和小学教员要求增薪等运动，不论规模大小时有发生。实际上直隶省的国民党工作完全在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之下。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卷土重来，重新进关。三月二十二日，国民三军孙岳退出天津，奉系军阀褚玉璞占领天津，接任直隶督办。已经公开了的国民党与各群众团体的活动又转入地下。但北京仍在国民一军控制之下，首都警察总监由国民一军的张璧担任，所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铁狮子胡同照常办公。五月间，国民党直隶省党代表大会就借这个地方开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选举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七个部

（组织、宣传、财务、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各部负责人均系共产党员。这时国民党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分开，市党部设在天津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省党部另租法租界效康里的房子。江震寰同志担任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兼作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工作，并利用义庆里这个地方开设党团员训练班，也有国民党员参加，每日下午由党的地委、团委及其他领导干部分别讲课，培养了一批干部。

由于北伐战争顺利进展，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出于对革命迅速发展的仇恨和恐惧，中国反动军警勾结英国工部局于十一月间，先在天津搜查了义庆里四十号，逮捕了江震寰等十五人，并立即由租界引渡给奉系军阀褚玉璞。紧接着在北京，国民军退出后，奉系军阀也查抄逮捕了北方区书记李大钊以下共二十人。京津两案，北方早期许多优秀共产党人均壮烈牺牲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

由于“五卅”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各地干部很多暴露了身份。继之，革命运动受到镇压。为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在一九二六年内，人事上有了一些调动。如卢绍亭调到西北，后因参加陕西渭华暴动而牺牲；杨洪涛调新疆工作，曾由报纸上得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枪杀；江浩调去广州，随北伐军到武汉；李希逸几次调北京，又几次调回天津；李培良曾调到唐山、北京工作。同时又先后送出一批人去学习，如：江韵清、汪秀江、肖质斋、于蓝田、赵迪等出国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辛璞田、李芳岑（李运昌）等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张金言（张明远）、解学海、马鸿图、陈临武等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或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这时天津地委书记是李季达，组织是于方舟，宣传是栗

泽。北方区由山西调傅茂公（彭真）为天津地委委员兼小刘庄区委书记。小刘庄区是天津地委的工作重点，曾由保定调来邢克让在那里工作，后又调来黄钟瑞和王佩珊夫妇在那里工作（后来黄、王又调唐山地委工作）。

“五卅”运动后，天津的妇女工作主要由邓颖超负责。一九二六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曾几次电催邓去广州，地委最后同意她去广州。此后天津的妇女工作，有一个时期由赵达负责。江震寰被捕后，李延瑞、李子芬和阎怀聘、宋树藩等组成团地委。为了迎接北伐，中央先后调北方区委陈乔年、邓中夏去中央，路经天津时，天津地委组织几个人听了他们关于政治形势和工作任务的谈话。我也是听讲者之一，感到很受教育。以后赵世炎也调回中央。以上三位领导同志在响应北伐军组织上海暴动时，均壮烈牺牲。

“五卅”运动虽然被镇压而受挫，但其影响和省港大罢工一样，给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谱写了前奏曲。

四、顺直省委建立前后

北伐军以磅礴的革命气势迅速进展，囊括和解放了江南半壁河山，惊煞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它们勾结在一起，在北方，特别是在京津两地，大肆搜查和逮捕，天津的江震寰等十五人，北京的李大钊等二十人均遭军阀杀戮，两地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历史车轮不可逆转，革命工作照样发展。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天津方面推派安幸生、张宗一两人为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返津后详细报告了大会集中力量批判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经过。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